



东大哲学典藏·萧焜焘文丛

自然哲学

| 萧焜焘 著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东大哲学典藏·萧焜焘文丛



自然哲学

萧焜焘 著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8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自然哲学 / 萧焜焘著. —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8
(萧焜焘文丛)

ISBN 978-7-100-16656-0

I. ①自… II. ①萧… III. ①自然哲学—研究 IV.
①N0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8) 第218114号

权利保留, 侵权必究。

(萧焜焘文丛)

自然哲学

萧焜焘 著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16656-0

2018年10月第1版 开本 640×960 1/16
2018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张 33 3/4 插页2

定价: 138.00 元

未敢忘却的记忆

萧焜焘先生离开我们已经二十年了。也许，“萧焜焘”对当今不少年轻学者甚至哲学界部分学者来说是一个有点陌生的背影；然而，对任何一个熟悉当代中国学术史尤其是哲学发展史的学者来说，这却是一个不能不令人献上心灵鞠躬的名字。在学术的集体记忆中，有的人被记忆，或是因为他们曾经有过的活跃，或是因为他们曾经占据的那个学术制高点，当然更有可能是因为他们提出的某些思想和命题曾经激起的涟漪。岁月无痕，过往学者大多如时光映射的五色彩，伴着物转星移不久便成为“曾经”，然而每个时代总有那么一些人，他们沉着而不光鲜，沉潜而不夺目，从不图谋占领人们的记忆，但却如一坛老酒，深锁岁月冷宫愈久，愈发清冽醉人。萧焜焘先生的道德文章便是如此。

中国文化中诞生的“记忆”一词，已经隐含着世界的伦理真谛，也向世人提出了一个伦理问题。无论学人还是学术，有些可能被“记”，但却难以被“忆”，或者经不住“忆”。被“记”只需要对神经系统产生足够的生物冲击，被“忆”却需要对主体有足够的价值，因为“记”是一种时光烙印，“忆”却是一种伦理反刍。以色列哲学家阿维夏伊·玛格利特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记忆的伦理”。它对记忆提出伦理追问：在被称为“灵魂蜡烛”的记忆共同体中，我

们是否有义务记忆某些历史，同时也有义务忘却某些历史？这个命题提醒我们：记忆不只是一个生理事件，也是一个伦理事件；某些事件之所以被存储于记忆的海马区，本质上是因为它们的伦理意义。记忆，是一种伦理情怀或伦理义务；被记忆，是因其伦理贡献和伦理意义。面对由智慧和心血结晶而成的学术史，我们不仅有记忆的伦理义务，而且也有唤醒集体学术记忆的伦理义务。

我对萧先生的“记”是因着本科和研究生两茬的师生关系，而对先生那挥之不去的“忆”却是超越师生关系的那种出于学术良知的伦理回味。四十年的师生关系，被1999年元宵节先生的猝然去世横隔为前后两个二十年。前二十年汲取先生的学术智慧，领略先生的人生风采；后二十年在“忆”中复活先生的精神，承续先生未竟的事业。值此先生书稿再版之际，深感自己没有资格和能力说什么。但经过一年的彷徨，又感到有义务说点什么，否则便缺了点什么。犹豫纠结之中，写下这些文字，姑且作为赘语吧。

萧先生对于学术史的贡献留待时间去写就。当下不少学者太急于将自己和对自己“有意义的他人”写进历史，这不仅是一种不智慧，也是一种不自信。我记住了一位历史学家的告诫：历史从来不是当代人写的。学术史尤其如此。我们今天说“孔孟之道”，其实孟子是在死后一千多年才被韩愈发现的，由此才进入人类学术史的集体记忆；要不是被尘封的时间太久，也不至于今日世人竟不知这位“亚圣”的老师是谁——这个问题如此重要，以至于引起了“不知孟子从哪里来”的现代性的困惑。朱熹、王阳明同样如此，甚至更具悲剧色彩，因为他们的思想生前都被视为“伪学”，百年之后方得昭雪，步入学术史的族谱。我不敢妄断先生在未来学术记忆中的位置，因为学术史上的集体记忆最终并不以任何人的个体记忆为转移，它既考量学者对学术的伦理贡献，也考量学术记忆的伦理，这

篇前言性的文章只是想对先生的学术人生或道德文章做一个精神现象学的还原：萧焜焘是一个“赤子”，他所有的学术秉持和学术成就，他所有的人生成功和人生挫折，都在于一个“真”字；不仅在于人生的真、学术的真，而且在于学术和人生完全合而为一的真。然而正如金岳霖先生所说，“真际”并非“实际”，学术和人生毕竟是两个世界，是存在深刻差异的两个世界，否则便不会有“学术人生”这一知识分子的觉悟了。先生年轻时追随现代新儒学大师牟宗三学习数理逻辑，后来专攻马克思主义哲学，又浸润于德国古典哲学尤其是黑格尔哲学，是国内研究黑格尔哲学的几位重要的代表性前辈之一。先生治学，真实而特立，当年毛泽东论断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核心，先生却坚持否定之否定规律是辩证法的核心，这就注定了他在“文革”中的命运。但是1978年我们进校师从先生学哲学时，他在课堂上还是大讲“否定之否定”的“第一规律”。当年，《中国社会科学》杂志复刊，约他写稿，先生挥笔写就了他的扛鼎之作《关于辩证法科学形态的探索》，此时先生依然初心不改，坚持当初的观点。萧先生是最早创立自然辩证法（即今天的科技哲学）学科的先驱者之一，但他首先攻克的确是“自然哲学”，建立起自然哲学的形上体系。直至今日，捧着这本当代中国学术史上最早的《自然哲学》，我们依然不能不对他的抱负和贡献满怀敬意。他试图建立“自然哲学—精神哲学—科学认识史”的庞大哲学体系，并且在生前完成了前后两部。遗憾的是，“精神哲学”虽然已经形成写作大纲，并且组建了研究团队，甚至已经分配好了学术任务，先生却突然去世，终使“精神哲学”成为当代中国学术史上的“维纳斯之臂”。

萧先生对东南大学百年文脉延传的贡献可谓有“继绝中兴”之功，这一点所有东大人不敢也不该忘记。自郭秉文创建东南大学起，

“文”或“秉文”便成为东大的脉统。然而1952年院系调整，南京大学从原校址迁出，当年的中国第一大学便只留下一座名为“南京工学院”的“工科帝国”。1977年恢复高考，萧先生便在南京工学院恢复文科招生，第一届规模较小，第二届招了哲学、政治经济学、中共党史、自然辩证法四个专业。我是七八级的。我们那一年高考之后，招生的批文还没有下发，萧先生竟然做通工作，将我们46位高分考生的档案预留，结果在其他新生已经入校一个多月后，我们的录取通知才姗姗来迟，真是让我们经受“烤验”啊。然而，正是这一执着，才使东大的百年文脉得以薪火相传。此后，一个个文科系所、文科学位点相继诞生。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萧先生是改革开放以后东大百年文脉延传中最为关键的人物，如果没有先生当年的执着，很难想象有今日东大文科的景象。此后，先生亲自给我们讲西方哲学，讲黑格尔哲学，讲自然辩证法，创造了一个个令学界从心底敬重的成果和贡献。

1988年以后，我先后担任先生创立的哲学与科学系的副系主任、主任；先生去世后，担任人文学院院长。在随后的学术成长和继续创业的历程中，我愈益感受到先生精神和学术的崇高。2011年，我们在人文学院临湖的大院竖立了先生的铜像，这是3700多亩东大新校区中的第一尊铜像。坦率地说，冒着有违校纪的危险竖立这尊铜像，并不只是出于我们的师生之情。那时，东大已经有六大文科学院，而且其中四个学院是我做院长期间孵化出来的。东大长大了，东大文科长大了，我强烈地感到，我们还有该做的事情没有做，我们还有伦理上的债务没有还，趁着自己还处于有记忆能力的年龄，我们有义务去唤起一种集体记忆。这是一种伦理上的绝对义务，也是一种伦理上的绝对命令，虽然它对我们可能意味着某些困难甚至风险。在东大哲学学科发展的过程中，我们曾陆续再版过先生的几

本著作，包括《自然哲学》，但完整的整理和再版工作还没有做过。由于先生的去世有点突然，许多事情并没有来得及开展。先生生前曾经在中国人民大学宋希仁教授的建议和帮助下准备出版文集，但后来出版商几经更换，最后居然将先生的手稿和文稿丢失殆尽，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这不仅是先生的损失、东大的损失，也是中国学术的损失。最近，在推进东大哲学发展、延续东大百年文脉的进程中，我们再次启动完整再版先生著作的计划。坦率地说，所谓“完整”也只是一个愿景，因为有些书稿手稿，譬如先生的“西方哲学史讲演录”，我们未能找到，因而这个对我们的哲学成长起过最为重要的滋养作用的稿子还不能与学界分享。

这次出版的先生著作共六本。其中，《自然哲学》、《科学认识史论》是先生组织大团队完成的，也是先生承担的全国哲学社会科学重大项目的成果。《精神世界掠影——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体系与方法》（原名《精神世界掠影——纪念〈精神现象学〉出版180周年》）、《从黑格尔、费尔巴哈到马克思》是先生在给我们讲课的讲稿的基础上完成的。《辩证法史话》在相当程度上是先生讲授的历时两学期共120课时的西方哲学史课程的精华，其内容都是先生逐字推敲的精品。《自然辩证法概论新编》是先生组织学术团队完成的一本早期的教材，其中很多作者都与先生一样早已回归“自然”。依现在的标准，它可能存在不少浅显之处，但在当时，它已经是一种探索甚至是某种开拓了。在这六本先生的著作之外，还有一本怀念先生的文集《碧海苍穹——哲人萧焜焘》，选自一套纪念当代江苏学术名家的回忆体和纪念体丛书。现在，我们将它们一并呈献出来，列入“东大哲学典藏”，这样做不只是为了完成一次伦理记忆之旅，也不只是向萧先生献上一掬心灵的鞠躬致意，而且也是为了延传东大的百年文脉。想当年，我们听先生讲一学期黑格尔，如腾云

驾雾，如今我居然给学生讲授两学期 120 课时的《精神现象学》与《法哲学原理》，并且一讲就是十五年；想当年，先生任东大哲学系主任兼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如今我也鬼使神差般在江苏社会科学院以“双栖”身份担任副院长，并且分管的主要工作也与先生当年相同。坦率地说，在自我意识中完全没有着意东施效颦的念头，这也许是命运使然，也许是使命驱动，最可能的还是源自所谓“绝对精神”的魅力。

“文脉”之“脉”，其精髓并不在于一脉相承，它是文化，是学术存续的生命形态。今天已经和昨天不一样，明天和今天必定更不一样，世界日新又新，唯一不变、唯一永恒、唯一奔腾不息的是那个“脉”。“脉”就是生命，就是那个作为生命实体的、只能被精神地把握的“伦”，就是“绝对精神”。“脉”在，“伦”在，生命在，学术、思想和精神在，直至永远……

樊 浩

2018 年 7 月 4 日于东大舌在谷

写在《自然哲学》《精神哲学》前面

关于自然辩证法作为一个独立学科，它的体系结构以及基本理论的探讨，一直是大家十分关注的一个问题。

自然辩证法似乎是一门新兴的交叉的边缘学科，其实是非常古老的。它旨在研究我们生存于其中的这个自然界是如何形成、演化的。两千多年以前古希腊米利都学派就是以研究世界的本原或始基（*arche*）开始其哲学生涯的。自然哲学是自然辩证法在古希腊的表现方式。

因此，自然辩证法首先要加以探讨的便是宇宙的构成问题，这就是哲学本体论问题；其次，自然辩证法要加以探讨的是宇宙的演化问题，这就是哲学宇宙论问题，从广义上讲，它涉及天体起源、生命起源、人类起源等方面。用今天流行的但未必确切的术语来讲，这些都属于所谓自然观问题。

我认为，研究宇宙自然的构成与发展，不能停留在追求一个永恒不变的实体上，而应该看到宇宙自然总是活动在时间之流中，因此，宇宙自然有它自己的历史行程。历史地看待宇宙自然，就要求我们对宇宙自然不但要进行横向的结构解剖，更要求对它进行纵向的过程追踪。这样一来，自然辩证法就必须以历史辩证法作为其延伸与补充。否则，它将是充分的、不完全的。

漠漠洪荒 历尽沧桑

我们首先接触到的是地球和地球上的存在物，以及日月星辰。人们合理地追溯到这个人类视野所涉及的自然界，在没有人类以前是不是存在，如果存在是一个什么样子？那浩渺的太空，那无际的碧海，那幽冥的地底又是一个什么样子？对如此等等进行想象和估计，人们便做出了关于宇宙自然的神话解释。

人类理论思维的能力逐步获得了发展，开始客观地观察宇宙自然，试图对其本原做出概括，概括的结论虽然是不足道的，但提出追溯万物之源的问题，说明人类的智慧已进入到了哲学意识的高度，从此人类逐步发展与加强了运用概念进行思维的本领，为哲学与科学的前进开拓了道路。

对我们生存于其中的这个世界的确切的命名是“宇宙”，东西南北、古往今来，它从空间和时间刻画了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是一个四维的整体发展过程。

那么，什么是“自然”呢？“自然”是宇宙的本性或本原（nature or arche），即构成宇宙的基质。关于本原的探讨，直到亚里士多德提出“实体”（substance）范畴才真正具有了哲学的意义。

关于实体的探讨与论述，构成了哲学本体论（ontology）的内容。本体论的研究就是关于宇宙的自然或本原的研究。宇宙的质的规定性就是存在及其演化过程。如果孤立看待存在演化过程之中的诸环节，则存在为多；如果视存在的演化为一整体过程，则存在为一。因此，自然首先表现为：存在与过程、一与多的“质量统一体”。

什么是“存在”（onto、being）？宇宙万事万物，尽管千差万别，但有一通性，即都是“存在”，存在、有、是，是一个意思，它是事

物最普遍的质的规定性。现在进一步追问：如何规定存在？三维空间是存在的抽象，它从数量上、形式上精确地刻画了这个“存在一般”（being in general）。三维空间是存在的内在的量。存在还有外在的量。宇宙是唯一的存在还是众多存在的组合？巴门尼德说存在是唯一的；德谟克利特则认为是众多的，它们就是原子。从唯一的存在进而到确立最高的存在，从而走上了论证上帝存在的道路；众多的存在发展到确立科学原子论，从而走上了论证物质结构学说的道路。

物质结构的探讨，科学地、深入地揭示了宇宙构成的奥秘，使我们得以大体上如实地描述我们生存于其中的这个世界。但是这种静态的结构解剖，给人的印象是点状的网络平面，事物在时间之流中经历的变迁，它的历史行程所留下的动态特征，这些就难以确切表述。存在必须在过程之中才是现实的，孤立的点状存在，虽然也可以叫作存在，但它是转瞬即逝的、行将幻灭的存在，而不是现实的存在。我们说存在处于过程之中，此语尚不确切，应该讲：存在即过程（process、becoming）。因此，自辩证法而言：“being = becoming”。存在与过程的统一，抽象地加以表述就是：三维空间加一维时间。于是，自然又可以表现为：“时空统一体”。

我们说自然是质量统一体、时空统一体都未能明确揭示自然的运动与发展的根源。宇宙是恒动的、永变的。谁使之变动？为什么以这样一种方式变动？变动有无终结与开始之时？如有，开始之前、终结之后又是一个什么情景？诸如此类问题，哲学与科学中有种种解答，但是不能认为都讲清楚了，今后能否讲清楚，也没有什么把握。漠漠洪荒，历尽沧桑，面对造化的无穷巨变，惊叹之余，使人油然而生穷究宇宙底蕴之感。

宇宙万物的变动，合乎常情的解释是：外力推动。由外力推动

而产生的运动的一个最基本的形式是“位移”。但是，推而广之，若说宇宙天体也是外力推动，那么就只有求助于宇宙天体之上的万能的上帝的指头了。外力推动说必然导致宗教，因此，想寻求宇宙变动根源的科学解释，只能向内追索，反求诸己。亚里士多德首先提出：自然为本原，本原为对立，对立是事物变动的内在根源。这一观点，对亚里士多德而言，虽然尚有不确切之处，但应该说是亚里士多德辩证法天才的活的萌芽。正是在这一点上，黑格尔、马克思、恩格斯充分而确切地发展与丰富了“对立”这一辩证法的基本概念。

宇宙万事万物作为一个整体，自身产生否定其自身的因素，形成内在的对立或矛盾，对立矛盾双方通过斗争，达到对立的扬弃、矛盾的转化，出现新旧递嬗，旧事物消亡，新事物产生。因此，自然最终表现为“对立统一体”。

如果说，自然首先表现为质量统一，基本上还属于感性直观方面，表现为时空统一，基本上属于抽象的知性分析方面，那么，自然表现为对立统一，就显现了宇宙内在的辩证本性了。从质量统一过渡到时空统一，然后归结到对立统一，这就是宇宙作为一个四维整体的辩证发展过程。

物华天宝 人杰地灵

宇宙的普遍规律是永恒的、绝对的，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这只是一种简单的抽象的说法。目前任何自然科学理论都是以地球为中心的。黑格尔甚至说出“太阳为行星服务”这样的话。这样的话也未必就是什么唯心主义，它无非说明科学研究总有一个出发点，有一个中心，有一个目的。无出发点、无中心、无目的的“三无科

学”是没有的。因此，宇宙的普遍规律不是永恒的而是历史的；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也不能简单地排斥人，当地球上出现了人，关于宇宙的研究就不能不考虑人的因素在客观上所起的或大或小的作用。

因此，关于宇宙整体的研究不能不从地球出发，以人为中心，以服务于人类社会为目的。宇宙的纯客体的研究必然要进展到关于宇宙的最高花朵，即作为精神实体的人的历史发展的研究。

人不是一个永恒的物种，他是在地球漫长的发展过程中逐渐演化形成的，其关键是“劳动”。此点已是人所共知的常识。从此，人在生物学的意义上最终与禽兽相区别而成其为人。但人尚未真正地成其为人。

自从人类社会有了私有制，有了阶级，有了人剥削人的现象，在政治经济学的意义上，多数人由于劳动的异化重新沦为禽兽；少数人由于游离于生产劳动过程之外，从而丧失了人之所以为人的劳动本质，实际上也不复成其为人，徒有人的外观而已。

劳动的异化必然导致劳动的复归。为彻底消灭剥削的革命斗争，实质上是人进入社会领域之后，要求在政治经济学的意义上也成其为人的斗争。劳动人民虽然由于劳动的异化丧失了人的生存条件，过着非人的牛马生活，但由于劳动技能的不断精进，实际上在改造世界、推动社会前进的过程中起决定作用，而且人通过工艺技术生产的锻炼，又不断提高其智慧水平，丰富其精神境界。因此，人类征服自然，理顺社会关系，从而掌握自己的历史命运的那一天必将到来，这绝不是什么呓语或幻想。

人是宇宙自身产生的否定因素、能动力量。有了人，宇宙才有了一面反观自照的镜子，才有了真正的客体与主体的对立，才有了自觉推动沉睡的宇宙定向前进的力量。河山巨变，人在地球上铭刻

了自己的印记，现在正在超出地球，向其他遥远的星球进军。人类观测所及，已达 200 亿光年的难以想象的遥远地区；人类剖析所及，已达 10^{-23} 厘米的微观领域。这是目前人类所能达到的限度，可以期望将来还将向外延伸，向内推进。但是，目前不可达到的领域，即完全排除人的影响的领域，不能认为是现实的宇宙，只能是潜在的宇宙。虽然根据推测，它是存在的，但对人类生存而言，是可以略而不计的。现实的宇宙是不能脱离人的，潜在的宇宙只能是设想的，因而不是不现实的。把我们生存于其中的这个自然界，区分为所谓天然的与人工的，在哲学上是毫无意义的，在科学上是毫无价值的。“人类社会”和它的“外部自然界”是完全不可分离的。

人在宇宙的发展中同时发展自己。剥削的消灭，劳动的复归，是人类改造自然与社会的历史性胜利，是人的内在本质的完全实现的中介环节。人必须在与自然社会的颌颞中继续前进，在精神世界中达到自我的完全实现。这就是说，要在意志、感情、思维领域中完全实现自己，即达到克服盲目任性的倾向，摆脱外在偶然性的支配，掌握历史的客观必然性，从而获得完全的自由与真正的解放。

人从生物学的意义上通过劳动成其为人；人从政治经济学的意义上通过劳动的异化，大部分丧失了人的生存条件而沦为禽兽，小部分丧失了人的劳动本质变成了衣冠禽兽；通过劳动的复归，人重新恢复了人的尊严，并进一步在精神领域净化自己，完全显现了人的本质。这就是人的脱毛三变的自我实现过程。这个过程简单说来就是：“生物的人—现实的人—完全的人”。共产主义奋斗的目标是在改造世界的同时也改造自己，即不单在生物上、政治经济关系上成其为人，而且要在意识精神上成为一个完全的人。因此，自然辩证法，由于自然界中产生了人，从而有了人类的历史，便必须进而发展为历史辩证法。甚至文学家巴尔扎克也意识到这一点，认为

社会是“大自然中的一种自然”。

历史辩证法是自然辩证法必然的延伸、补充与完成。它们是一脉相承的。

宇宙之花 人生之光

人的意识精神活动，首先是向外驰骛，把自己的能力视为当然的。它认识、观察与解剖外部世界，精审入微，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它一旦反躬自问自己的意识精神活动、自己的认识能力时，却一时难以找出它们之所以正确的根据。“认识自己”是希腊德尔斐庙镌刻的格言，但人类认真地探索自己，自西欧而言，严格讲，从康德才开始。精神现象的历史与逻辑的发展，从现象到本质予以揭示的研究，迄今为止，只有黑格尔在唯心的神秘浓雾掩盖下才完成了这一伟大的历史勋业。

原始人为了生存必须结成群体，群体的发展，通过民族、家庭、国家等社会组织形式，构成了人类社会的发展。合群性便成了人的社会本性。

群居生活中逐渐形成了共同信守的行动规范，以协调与维护社会群体。这样就形成了人类社会的政法与伦理关系。政法关系与伦理关系均属行为规范，不过政法是强制性的，伦理是舆论性的，二者相互补充，都是为了巩固与发展人类社会，使其免于崩溃的危险。

如果说，政法与伦理有硬软之分，那么，伦理与道德便有客观与主观的分野。伦理是客观精神，道德是主观精神。道德属于自我修养，它对尚有客观效准的政法、伦理规范，自觉服从，身体力行，就好像这些规范完全出自内心，不如此做，便深感内疚，无地自容。但道德修养并不是培养奴才性格。当政法、伦理规范一旦失去了它

的客观有效性及历史的必然性时，它不但不能维护社会的生存，而且将导致社会的崩溃。这时道德修养受高度社会责任感的驱使，一反温顺驯良之故态，拍案而起，以自我牺牲的精神，无条件地担负起挽救社会沦丧之使命。此时道德感升华到神圣的地位。历史上开拓社会前进的英雄，便是这种崇高的神圣道德的典范。

政法、伦理、道德是人类的意志的表现。意志的粗野的感性实体是“欲望”，那原始的情欲与冲动，人与禽兽并无二致。人类从野蛮进入文明，欲望被控制在社会许可的规范之内，并从而升华为意志。意志不能完全脱离情欲，没有情欲的所谓意志是僵死的，不可能转化为历史的行动。黑格尔曾经讲过：“假如没有热情，世界上一切伟大的事业都不会成功。”巴尔扎克也说：“激情是人间各种事物中真正绝对的东西”，它成了意志力的内在的动因。但意志并不是纵情任性，它如果不符合历史发展的必然，即不合理，那只是莽撞的盲动，也不可能成功。因此，意志一定是有情合理的。它的展开，通过三个环节：“强迫的一舆论的一自觉的”。因此，政法、伦理、道德是意志自身辩证发展过程的内在环节。

情欲升华为“意志”(will)，净化为“感情”(feeling)。感情不可究诂、不容分析，但又澎湃于心，波澜迭起。感情是人生的斑斓色彩，人生而无情等于槁木死灰。仇恨与爱情、痛苦与欢乐、依赖与拼搏等等感情表现是每一个人都具有的。黑格尔甚至说：痛苦是人类的特权。因此，且莫诅咒苦难的人生，正是有了苦难才成其为人生，而苦难的克服才有真正的欢乐。乐从苦来，这是人生真谛。

自然的灾难、社会的坎坷，使人惶惶不可终日。他感到自己渺小，总想托庇于一个巨大的神灵支撑他虚弱的灵魂，于是产生一种宗教感情。宗教感情是人类感情脆弱的、消极的方面，有待克服的方面。安慰，是不可缺少的，它可以帮助人渡过无边苦海，重建生